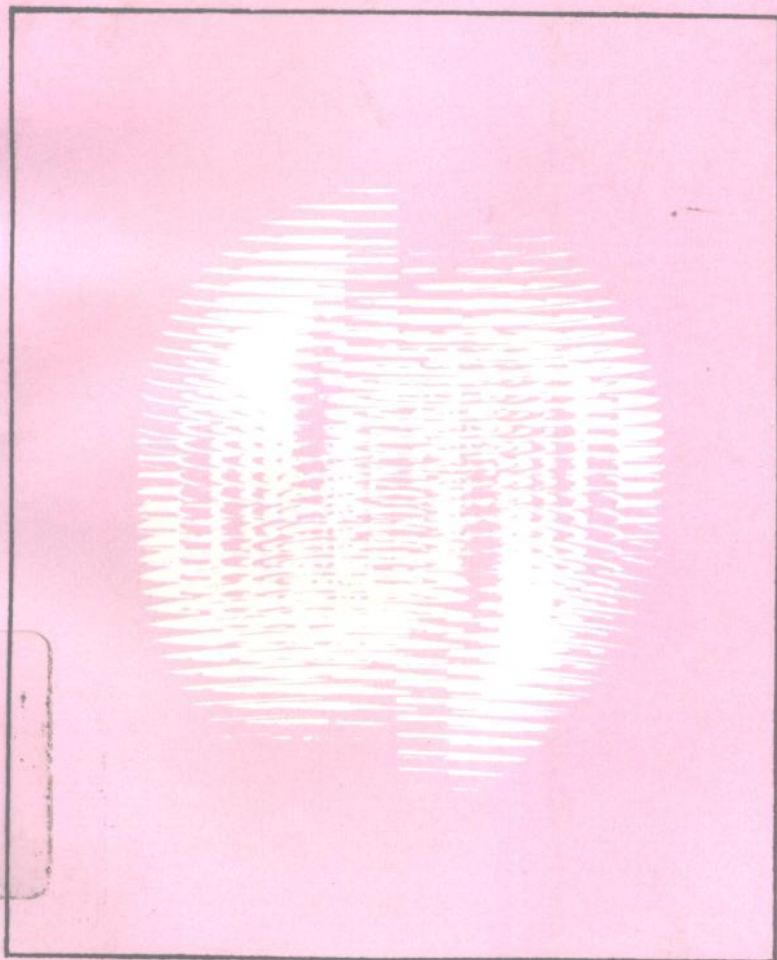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

【美】尼尔·丁·斯梅尔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3064

C 91-03
1

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

〔美〕 尼尔·J·斯梅尔塞 著

王宏周 译
张平平

D240/03



2001178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Neil J. Smelser
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6

本书根据美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
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76年版
译出

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
〔美〕 尼尔·J·斯梅尔塞 著
王宏周 张平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1202 工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9印张 232千字
印数0001—3000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287-2/C·29 定价: 5.6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这部著作的进展与我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研究所的协作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我与一批学者的合作，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该研究所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始创于1965年，是戴维·阿普特 (David Apter) 设想的一个产物，他后来成了该研究所的所长。阿普特要我主持这个小组，我从此承担了这项工作。此后的两任所长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和卡尔·罗斯伯格 (Carl Rosberg) 都给了这个小组以极有力的支持和关怀；克利奥·斯托克 (Cleo Stoker) 巧妙地安排了它的预算；佩吉·德尚 (Peggy Dechant) 和弗朗西丝·布朗 (Frances Brown)，以及米尔塔·赫南兹 (Mirtha Hernandez) 也都在不同时间实际安排过这个小组的会议，他们都是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这个小组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1965年为该研究所提供的基金。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在10年内不断支持该小组工作的人们表示谢意。

在这些年内，该小组有10—15名来自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各社会科学系的学者，大概还有两个作为见习研究人员的高年级学生，以及偶尔还来一个其他大学的访问学者。在这10年期间，我们大约每三个星期就聚餐并讨论一次，我们相互阅读和批评对方的著作；我们还邀请过一些其比较研究著作激起我们关注的访问学者；我们批判地阅读和讨论过过去10年出版的许多重要的比较社会科学研究文章，并且出版了《社会学的比较方法》^①，它是由我的同事和朋友，已故伊凡·瓦里尔 (Ivan Vallier) 组织和编辑的。

这个小组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于，尽管它的成员长时期连续在小组里工作，但是，个人都坚持拒不采用那些老一套已经反复陈述过的理论见解，它的讨论是公开的，范围开阔，措词出人意料。该小组的道德一贯非常高尚，因此，真正激烈的同事们之间的批评都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而且总是以批判的态度评论最高层次的学术成就。在整个狂乱的60年代和匮乏的70年代，它都始终保持了这种学术态度；在这个科学研究受到多方面政治和经济力量威胁的时期，这个小组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进行理论交流的天堂。

本书的许多思想就是在这个小组里提出、探索、加工和充实的，尽管由我对本书负责，但我觉得，我在该小组的同事们在许多方面都是我的合作者。对于多年来一直是该小组成员或访问学者的所有人，我这里就都不提了，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曾经在1975年1月23日晚上讨论过本书初稿的人们，其中包括研究社会学的罗伯特·贝拉 (Robert Bellah)、埃尔巴基·赫马西 (Elbaki Hermassi)、利奥·洛温撒尔 (Leo Lowenthal)、阿瑟·斯廷奇库姆 (Arthur Stinchcombe)、研究人类学的伊丽莎白·科尔森 (Elizabeth Colson)、尤金·哈梅尔 (Eugene Hammel)、研究政治科学的莱因哈德·本迪克斯 (Reinhard Bendix)、卡尔·罗斯伯格、研究史学的马丁·马利亚 (Martin Malia)、弗雷德里克·韦克曼 (Frederic Wakeman)、欧文·沙因纳 (Irving Scheiner)、研究经济学的艾伯特·费什罗 (Albert Fishlow)、史学研究生劳伦斯·迪基 (Lawrence Dickey)、约翰·赞米托 (John Zammito)、以及在华沙大学研究社会学、并且是行为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人员的斯蒂芬·诺瓦克 (Stephan Nowak)。我还应该提到研究社会学的查尔斯·Y·格洛克 (Charles Y. Glock)，他这天晚上没有参加，但是，他在方法论方面的知识多年来使我得益匪浅。

不过，虽然本书是作为一种积累的产物出现的，但是最后阶

段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却是在1973—1974年完成的，当时，我已经度假离开了伯克利。在通货膨胀肆虐的欧洲，我当年是靠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供的假期薪水以及约翰·西蒙·古根海姆（John Simon Guggenheim）纪念研究基金维持生活的；研究工作的杂费则由国际研究所提供的少量追加拨款支付。我当年有大约一半时间是在伦敦度过的，我在那里靠的是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以及我作为访问学者的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的图书馆，我非常愿意感谢所有这些图书馆、以及前一个时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于我如饥似渴地借阅图书杂志，总是报之以有效的工作和笑容。有几个月，我们全家都住在法国兰岸文化区滨海卡涅一个名为马维的别墅里，以及意大利北部拉戈迪加尔达地区马德尔诺的一座别墅里，大部分实际撰写工作都是在这几个月完成的。国外这一年的经历是令人愉快的，因此，本书后面的任何乐观主义描写都应在意料之中。

1973年11月，当我们全家正在巴塞罗那度假的时候，窃贼打破我们的野营车，抢走了许多宝贵物品，其中有我唯一一本比较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方法论观点的笔记。我为窃贼们明显有教养的理论兴趣感到某种欢快，但这并不能抵销丢失东西给我造成的惶恐。在失望中，我给伯克利社会学系的几个研究生写了信，他们都听过我讨论这两个学者的方法论问题的社会学理论课程。乔伊斯·伯德（Joyce Bird）、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梅加里·萨福蒂·拉森（Megali Sarfati Larsen）、马克辛·拉兹（Maxine Raz）、露西·塞尔斯（Lucy Sells）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等几个学生，答应我的要求，给我寄来了几个复印的听课笔记本。与已经消失在西班牙下层社会之中我原来那些笔记相比，这些笔记本拼凑起来的道理似乎更充分，包含的观点也更多。我肯定，由于这个完美无缺的插曲，第三章读起来会更加理想。

本书草稿的关键部分或多或少是在离开有关专业同事们的情

况下完成的，所以我在回美国之后，就邀请了许多人批判地阅读这个手稿，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小组成员的反应是提出了很多必须修正的意见。此外，下面一些人在仔细阅读基础上提出的具体意见也使我颇受教益：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华盛顿大学的赫伯特·科斯特纳（Herbert Costner），里弗塞德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歇尔·迈耶（Marshall Meyer），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的惠特尼·波普（Whitney Pope），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弗雷德里克·普赖尔（Frederic Pryor）和里弗塞德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这些读者的评论通常是很深刻的，他们使我删去了许多粗俗而不恰当的内容，并且鞭策我就一系列方面进行了重大改动。我感谢所有这些人，并且加上一句否定性的套话：他们对这个最终产品不承担任何责任。

N. J. 斯梅尔塞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① I. 瓦里尔编《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研究趋势及应用的论文》（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ssays on Trends and Applications）（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 近几年来，涂尔干已经被译为迪尔凯姆。本书仍沿用中文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译法，译为涂尔干——译者。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本书的目的	(1)
第二章 比较分析家托克维尔	(7)
托克维尔关于社会变化的一般看法	(8)
托克维尔对法国和美国之间差别的解释	(11)
托克维尔的比较方法	(22)
对托克维尔比较战略的评价	(30)
结语	(36)
第三章 涂尔干和韦伯的比较社会学纲领	(42)
社会学中的科学知识	(43)
关于社会学的论题	(48)
社会学研究的分类	(53)
社会学解释	(61)
社会学中的证据	(65)
结论	(74)
第四章 涂尔干的比较社会学	(81)
涂尔干关注的主要问题	(81)
定义 描述 分类和计量	(83)
涂尔干社会学中的因果网络	(89)
涂尔干的比较方法	(106)
第五章 韦伯的比较社会学	(130)
韦伯所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	(130)
定义 描述 分类和计量	(131)

因果关系模式和解释战略	(139)
韦伯的比较方法	(156)
涂尔干与韦伯研究的结语	(164)
第六章 分类 描述和计量	(171)
科学事业就是为控制变化而奋斗	(172)
比较分析的研究态势：单位、概念、指标和研究者	(181)
分类与可比单位	(185)
比较研究的变量	(192)
经验性指标的可比性	(202)
结语	(209)
第七章 联系 原因 解释和理论	(223)
个案研究的制约因素	(225)
扩大案例数目	(226)
闲话特殊和一般的困难局面	(229)
关于相伴关系的一些评论	(231)
提高对因果推理的信心	(237)
关于各种联系的理论背景	(255)
结束语	(266)

译后记

第一章

本书的目的

组成成为一种社会的人们，不可能对以不同于他们的方式管理其社会生活的其他人的行动莫不关心，为什么会如此呢？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选择不同形式道德和习惯的集团，就是对本国社会提出的一个威胁，它表明，他们自己的道德和习惯，可能并不象他们普遍坚持的那样正确、神圣或具有普遍性。对于这样的威胁，人们常常报之以敌视或厌恶，反过来，这种敌视或厌恶又可能成为一种工具，用以惩罚或控制他们之中由于受诱惑而企图变异的人；^①或者，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威胁无害，但是一种异己或异常行为，这种反应也可能被用于社会控制的目的；或者，他们可能提出一种“容忍”这种威胁的途径，也就是说，把它纳入更为广泛的类似领域内，使其失去其意义。另一方面，一种外来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一种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那些视他们自己集团的道德和习惯是某种制约或压迫形式的人们。伴随着对“伟大原始时代”或简单田园生活的崇拜，必然要明显地或含蓄地出现一种疏远当代社会的态度。总而言之，必然把对各种差异的迷恋，看作是人们对有助于在国内社会形成单调生活的社会化和控制力量的矛盾心理的反映。

在评论由国内的矛盾心理反映出来的各种差异这类普遍倾向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这就是歪曲这些差异。既然一个集团总是根据自己的偏见对不同的集团作出反应，所以，它就不可能象这个不同集团所实践的那样去看待该集团的生活方式；或者

就认识而论，既然一个集团坚持主要按自己的实践范畴去观察他人的经验，那么，它对其他人的理解和预言就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其他人必然会在不同于这个国内集团的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去组织他们的实践，采取他们的行动。

在人类思想史上，人类集团歪曲他们对“不同”集团的认识的倾向，只是在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同样，为克服这种歪曲而进行的严肃努力，相对也是在最近才出现的，其途径是超越单独一个集团的实践范畴去认识社会生活的差异。大部分这样的努力都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的，尤其是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对于这种努力的定名各有不同，例如“比较研究”，“交叉文化分析”，以及“跨国分析”。无论它们的名称如何，它们都是叙述、解释和发展社会文化现象理论这个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而这些现象所赖以发生的社会单位即集团、部落、会社和文化，显然是相互不同的。

我在本书中的目的就是要估价某些这样的努力。我打算问一问：在不同社会单位的知识产生过程中会出现哪些种类的问题；研究者在其研究过程中如何论证这些问题；他们怎么样才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必须立即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个目的。首先，我并不认为“比较社会科学”或对不同社会单位的研究，是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类研究。涂尔干评论说，“比较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就它已不再是纯描绘性社会学，并且渴望对事实进行说明而论，它就是社会学本身”。^②其他人也同意这种观点。

例如斯旺森评论说：

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和含蓄的比较充满了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

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会社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③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我可以指出，即使应用一般描述性词语于一种情势，例如“人口稠密”或“民主的”这样的词语，也要以某种范围内或多或少是稠密的，或者或多或少是民主的情势为前提，并且假定这种被描述的情势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对明显不同单位、特别是不同社会或文化中某种现象的分析，应该不存在这种现象所特有的方法论问题，一切方法论问题都出现于对相对是类似的单位的分析，好比同一个国家中同一地区的一些城市；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美国白人中间阶级女性；因为，这种分析包含着对在某些方面相互有别的单位进行比较。所以，“比较主义者”所面临的方法论问题，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把注意力集中于明显不同单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从积极方面说，这些方法论问题，例如确立同等标准，或者是控制第三变量，在对比不同单位时都会极明显地突出出来；从消极方面说，解决这些问题似乎都会为比较严重而明显的困难所烦恼。然而从一切方面考虑，本书大胆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对社会科学都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个说明是，我的“方法论”概念比该词有时候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我设想，该词指与科学探索的规范标准相关的研究活动的批判性评价。这种评价的某一些，涉及研究计划、计量方法以及其他技术程序问题，例如选择恰当的指数以检验既定的假设，设计进行跨国调查的表格，抽样活动，编纂答案等等，我将非常注意研究明显不同社会单位所采用的这类程序。然而，对方法论的研究还应该以科学探索的概念方面为重点，因为，恰如其分的科学研究会由于研究者所使用的哲学假设和理论框架，会由于他在其大量理论前提之间移来动去的方式，以及他的实际研究活动而受到影响。因此，我还要强调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并且

触及科学哲学的某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提出研究比较性的科学知识的工作是否恰当有密切关系。

本书的主要战略在于批判地考察各种比较研究，而且，我将经由一系列阶段，从考察既没有自觉采用某种方法论，亦没有使用复杂的经验性计量方法或研究技术的解释性研究，转向考察既自觉地采用某种方法论，亦使用了复杂的经验性计量方法或研究技术的解释性研究。我将从总结和评价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对美国 and 法国的比较评论开始。托克维尔从没有为他的研究写出个方法论，他严重依赖于印象主义的资料，没有发展一种精确的系统理论，以便说明他的比较评论；尽管我们将会看到，他的思想的组织是很严密的。虽然他的著作相对是不规范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出他所遇到的某些明显的方法论问题，因为实际上，他也在力图提出一种比较研究，尽管常常是不明确的。此外，对于他排列其有用资料的方法，我们也可以作些评论，这些资料都是他进行论证时所使用的。

下一步，我将考察传统比较研究中的两位巨人即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比较研究。关于社会学研究的性质和比较著作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这两个学者都提供了雄心勃勃的方法论陈述；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迄今仍然是最出色的，尽管他们所使用的资料的质量和研究技术，与他们的时代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相比是粗糙的。在第三章，我将批判地考察由这两个人提出的社会学纲领，这些纲领在某些方面是根本对立的。由于经验研究的迫切需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从本质上以及方法论上看，这种改变使两个学者更为接近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将对他们的许多经验性比较研究进行考察，鉴别他们的研究程序，指出各人面临的问题，评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说明正在他们之间出现的各种形式的类似和区别之处。

本书的其余部分将集中力量于涂尔干和韦伯以后的比较研究，我无意历史地探讨这些研究，只力图说明、而不是详尽评述为改善比较研究知识而发展起来的不同战略和技术。然而，我将充分论述几十年来在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交叉文化”传统，最近在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萌生的“跨国”传统，以及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对现代化进程连续不断进行的比较研究的努力。心理学家们在交叉文化的基础上，为研究人的个性以及为进行实验作出了努力，我还要对此作一些说明。这些研究传统之所以能够发展，之所以可能形成，确实是由于资料的生产、储存和复原工作的改善，复杂的推理程序的发展，以及研究者在方法论和理论方面的自觉性的提高。第六章和第七章将批判地评价最近时期的比较研究。第六章考虑在对明显不同的社会单位的经验性现象进行分类、说明和计量时产生的方法论问题。第七章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出现于比较研究确立各种联系和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于把这些联系和因果关系组成为一种适用于不同单位的理论模式的过程中。

因此，随着本书的发展，我的研究将由不太系统向着比较系统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分析继续下去的同时，人们将可能看到在比较研究中存在着本质上极为不同的重要问题，举几个例子说，如何解释祖父母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测定和分析精神健康状况时的交叉文化差异；如何分析国家对压力形势作出反应时的差别等。而且，人们也将看到为改善比较分析质量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令人迷惑不解的特殊战略和技术。尽管存在这种本质的、战略的和技术的差别，但支配着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其数量显然是很少的，特别是，人们会发现在本书所评论的所有比较研究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惊人的连续性，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比较研究。这种连续性产生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将要考察的所有的理论家和经验研究者，都力图控制和操纵社会生活的各种因果条件，从而确定一个适合于这种或他种条件的案例。这些

进行控制的特殊方法，在种类、结果以及科学效用方面都表现出极大变化，但是，将要予以研究的所有这些方法相互比较起来，的确都可以这样认为：它们都力图通过控制社会现象变化的条件和原因，去解释这些现象。

①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乔治·辛普森 (George Simpson) 翻译 (伊利诺斯，格伦科自由出版社 1949年) 第一卷第一章。与涂尔干就社会对犯罪和有关异常形式所作反应的解释相比，这个评论并没有什么不同。

②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39页。

③ 盖伊·E·斯旺森 (Guy E. Swanson)《比较研究的框架：结构人类学和行动理论》。见I·瓦里尔编《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第145页。

第 二 章

比较分析家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作为美国社会一个远见卓识的著名评论家，① 作为一个渊博的预言家，② 作为大众社会的一个理论家，③ 作为最早一个论述革命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家，④ 以及较小程度上作为参加和围绕1848年法国革命活动的政治人物，⑤ 人们已对他进行了广泛赞扬和深刻分析。然而，他的著作尚没有从比较分析的角度给予广泛研究，⑥ 尽管他比较的重点已得到广泛的正确评价。

在进行这种分析时，我的意图是把托克维尔的两部经典著作，即《美国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看作为比较社会学解释的一项重要研究。一眼看上去，这样作似乎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两部著作的出版相隔20年以上；前者主要致力于描绘、分析和研究整个国家间社会平等条件产生的结果，后者则致力于考虑不朽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和后果。然而，有关这些著作的研究表明，在这两部著作中，托克维尔研究的重点都是一系列涉及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专制，以及政治稳定性和失去稳定性的理论问题；而且，这两部著作形成为某种双面镜，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条件的分析为他对法国社会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反过来，他对法国社会的分析也为他对美国社会条件的研究所说明。⑦ 最后我希望说明，正是他的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重要观点，表明了他对法国和美国的看法，并且使它们成为两个可以比较的国家。

本章将分为三节，在第一节中，我将概述托克维尔有关西方

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特别要论及平等问题。在第二节中，我将概述他对不同平等条件的考察，以及他对美国和法国之间差别的分析。在第三节中，我将论证他的比较战略——他为支持其案例而使用的各种经验性资料和逻辑推理方法。

托克维尔关于社会变化的一般看法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分辨出唯一一个压倒一切的主要问题是可能的，不论及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估价他的评论或考察，这个问题就是社会平等对社会不平等。

不过，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托克维尔有意考察了社会平等形成的两种极端方式：贵族社会方式和民主社会方式；在贵族社会，平等达到最低限度，在民主社会，平等达到最高限度。尽管托克维尔并没有提出任何一种象“理想的类型”(ideal type)那样的方法论，但是，他在整个著作中所使用的贵族与民主的概念表明，它们的确是抽象概念，完全没有经验性例证与之相对应，不过，却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不同程度与之相近似的例证。^③

为了找到一个近似于按照贵族价值观念组织起来的纯粹社会案例，托克维尔追述了11世纪的法国：“领土在少数家庭之间进行分配，它们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居民的统治者，由家庭世袭的统治权力，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暴力是以人治人的唯一手段；地产是权力的唯一源泉”。^④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立场看，这是不平等的，但是，中世纪欧洲的法国和其他社会，还是通过约束专制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惯例和协议进行管理的。

在欧洲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法律以及人民的拥护，赋予了王公贵族以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但他们却很少使用这种权力。我并不是说贵族的特权，高等法院的权力，社团及其特许的权利，或者是那些有助于削弱君主统治的打击和维持